

前 言

某日，我通过因特网的站点之一 TELNET 进入了链接加利福尼亚大学系列所有图书馆的 Melvyl 系统。然后，在人文科学类书目中检索与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相关的书籍。于是，查知其著作共有二百零八本。读着那些关于福柯的各国文本著作的书目，再次感受到“世界的福柯”这一评价的分量。

福柯去世，已历十二载。此间，柏林墙崩溃、东西德统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与福柯同时代的德鲁兹 (Gilles Deleuze)、伽达默尔 (F. Guattari) 去世了。福柯的恩师之一阿尔都塞 (Louis Althusser) 也去世了。

想来，此十年前，后时代的潮流逝去之疾令人瞠目结舌。思想世界的变化亦为激烈。曾风靡一时的宠儿也如垃圾般被丢弃，人们在不断地追求新事物的过程中继续前行。这是个为迎合时代而不断变化的现象引人注目的世界。

但是，“新”到底是什么呢？

“新”并非迎合时代，而是面向时代、对其说“不”的行为。打破常识的局限、动摇人们所依托之现实，这

种智慧的努力，难道不是在为世界创造出新的可能性吗？想及此，就不能不说福柯的事业是常新的。因为他曾在不断地进行着对现存框架的挑战。

到了 20 世纪末期，各种各样的框架被摧毁，巨大的空洞、空白充斥于世界。所以，此时重新研究福柯的思想，正是可能在世界产生新智慧的第一步。

福柯，正在接受新读者。福柯在问：“我为何在此？”“我为何痛苦？”“我是谁？”福柯曾说自己的事业是一部“自传（我的故事）”，读者从中也能读出自己的故事。其实，福柯的思索同生活在现代的我们的生存苦恼正是密切相关的。

为追寻新思想的足迹，让我们打开福柯的“武器库”吧！

序章 福柯之死

波 纹

五十七岁之死

1984 年 6 月 25 日在巴黎的萨贝台尔慈善医院 (La Pitie Salpetriere) 法兰西学院 (College De France) 教授、思想家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因感染艾滋病而死亡。那时，他的五十七岁生日才刚过了八个月。当时，世界读者期待已久的“性的历史”系列中的两册《快乐的活用》和《自我的关爱》刚刚由加厘玛 (Gaston Gallmard) 出版社出版。

5 月 14 日，他去世前的一个月左右，他的朋友库罗德·毛里雅克 (Claude Mauriac) 正要从位于塞巴斯廷·博顿大街 (Sebastian Button) 的加厘玛出版社出去时，偶遇福柯。福柯带着三本刚出样本的《快乐的活用》他送给毛里雅克一本并在书中写下了“相逢的留念 友情的证明——赠给库罗德·毛里雅克”。福柯正在满怀希望地等待着 he 已完成的著作出版。

不幸的是,6月2日他在巴黎市十五区沃吉阿街(Volere)自己的住宅中失去知觉,倒下了。他立即被送到了克里尼克·圣米歇尔私立医院(Clinic Michel),9日,转到萨贝台尔慈善医院。他曾经有一定程度的恢复与熟人、朋友见面,读信件,关心人们对新作的反应,还拟订了去安达卢西亚(Andalucia)及厄尔巴岛(Elba)的旅行计划。而且,他还流露出对因住院治疗而中断观看巴黎网球公开赛的电视节目的不满。他特别想看麦肯罗(Mackenlot)与朗德(Lender)的比赛。可是到了6月24日他病情骤变,发高烧,于翌日死亡。

可是那时并没有公布这位世界著名的思想家的死因是艾滋病。萨贝台尔慈善医院的神经科主任波尔·卡斯忒纽(Paul 教授和布吕诺·索隆(Brunot Solon)医师在征得福柯家属的同意后,于翌日的《世界报》(Le Monde)上(26日下午出版的27日版的第十版下部)发表了如下声明:

米歇尔·福柯先生,于1984年6月9日住进萨贝台尔慈善医院的病房,这是由于他出现了与败血症并发的神经疾病的症状,需要进行必要的附加检查。通过检查,查明其脑中有已化脓的病灶。抗生素的使用,开始时曾相当有效,病状因而暂时得以缓解。所以米歇尔·福柯先生于上周获悉了他最新著作的最初反响。但是,病情的突然恶化,夺走了一切治愈的希望,6月25日下午

一时十五分，死神来访。

时代病

其后至今，这个正式声明从来没有被推翻。可是，在他死亡的第二天，《解放报》（*Liberation*）的短评“昨日午后一时……”中用词古怪，酿起众议。该匿名短评写到：‘他尚尸骨未寒，便有谣言传出，说福柯乃死于艾滋病。’而且，文章还写到：

虽未公开其同性恋者（*Homosexual*）之身份，但是，这位堪称特别的知识分子，似已成当今流行病偏爱之标的。观其诊断书，毫无疑问，福柯确是患上了一种癌症，此癌症属特种癌，在癌症这种现代病中的病例也只占百分之二。所以，如此充满恶意之谣言只能令人哑然。那谣言似乎在宣称，福柯的死必须被蒙以耻辱。

这个短评，激怒了报纸的读者，抗议信纷纷涌至《解放报》。似乎死于艾滋病是耻辱，此等报道，乃助长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和偏见之行为，作为独立的左翼报纸而获得高度评价的《解放报》难道该容忍这一立场吗？可是，迪迪埃·埃里邦（*Didier Eriron*）^[1]认为，该评论的笔者似乎的确是想要驳斥玷污福柯名誉的流言，以庇护福柯之声誉。

福柯的存在，在‘帝王’萨特（*Jean Paul Sartre*）死后的法国思想界是绝大的。一例为证，即《新观察》

[1] 迪迪埃·埃里邦：《米歇尔·福柯传》作者。



报道福柯之死的《世界报》（1984 年 6 月 27 日）

（Le Nouvel Observateur 杂志 6 月 29 日号刊载的皮埃尔·诺拉 Nora 的追悼文。诺拉是历史学家，是被称为“无政府”派（Anarcho）的历史学界主流的中心人物之一）

福柯死了。听到这消息，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无不感到身心受到猛烈的冲击。的确，虽然他还年轻，但已获声名，独树一帜，君临其学著丰盛之世界，他确实独特、神圣、不可动摇地存在着。然而，作为一名哲学家，他突然死亡了。……任何时代，皆有表现其时代特征的现象。60 年代到 80 年代之间的年代，是最好的、也是最坏的。他曾同那个时代、同我们不停地捉着迷藏，游戏仍没有结

束。从这个有着恶魔般容貌的人物的内心，人们会发现代表其各自时代的人物。^[1]

作为代表时代而存在的福柯的“死”的确造成某种时代的空白 而且 正因为如此 福柯因已成为“时代病”的“艾滋病”而死的谣言 才具有说服力和压力。所以，“谣言”虽然被否定 而后它还总要再现。首先 在美国的同性恋群体中，此事引起了轩然大波。1984 年夏 福柯于 1982 年在美国接受的采访“采访性、权力及同性的政治”在《鼓吹报》(Advocate)上被发表时，其注脚中所注的福柯并非死于神经系统疾病一事，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进而，《纽约土著》因《纽约时报》未报道福柯的死因是艾滋病而对其进行指责。70 年代后期，福柯在旧金山的同性恋专用浴场说了些什么之类的传言又纷纷扬扬起来。

J·P·阿伦 (Aron) 的责难

福柯可能已经知道自己感染艾滋病了吧？据迪迪埃·埃里邦说 福柯于死前的冬天打电话给乔治·杜美吉尔 (Georges Dunezil) 说：“我已经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福柯的朋友保罗·贝努 (Paul Behaine) 在福柯死后看了福柯的日记 他说 福柯在 1983 年 11 月的日记中这样写到：“我知道自己患的是艾滋病。可是 因歇斯底里的缘故 可以将其忘却。”

可是 福柯之死与艾滋病有关的说法 其后仍被回避。法国社会的正式媒体中关于福柯死于艾滋病的报

[1]《我们的福柯时代》。

道是 1987 年 10 月曾是福柯朋友的历史学家、哲学家保罗·阿伦·让发表的‘我的艾滋病’的自白。^[1]

阿伦是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主任教授，1981 年曾就任密特朗总统的社会党内阁的文化部长朗葛·雅克的学术顾问，当时还兼任国立图书馆的学术审查会长，是数得着的文化人。他的堂兄列蒙·列阿伦是一位哲学、社会学家，他的家兄阿伦·罗贝尔是主笔撰写希政权历史的历史学家。他与法兰西学院的教授洛兰·巴尔特既是亲友又是论敌，与福柯是年轻时代的朋友。

阿伦在与伊丽莎白·修拉姆的访谈中披露了自己的同性恋者身份，这在法国社会的名人中尚属首例。他承认他于 1986 年 1 月得知自己感染了艾滋病，并一直在与病魔作斗争。于是，其后，对隐瞒福柯是同性恋者及感染艾滋病一事，他进行了指责。

福柯是生活在语言中的人，是知识人，是真理人，而不是生活在实际的经验和感觉中的人。他是同性恋者。他偶尔以轻率的作风享受那种生活并感到羞耻。他对艾滋病保持着沉默，所以我不高兴。因为那是由羞耻而来的沉默，而非一个知识人的沉默。这沉默难道不是与他所宣扬的完全相反吗？！

我认为这是愚蠢的。福柯是我们二十五岁时的同年级同学，我们还是好朋友。他的著作把他

[1]《新观察》杂志 10 月 30 日号。

的名声推上了顶峰。可以说，他几乎是战后时代压倒一切的思想巨匠。他已经以王者之尊，君临占统治地位的知识分子体制，而我已经不从属于该体制。如今，我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是愚蠢的，心灵也因此感到了宽慰。可以说，我因哲学的过敏攻击了福柯，其实，其中还有另一个理由，这理由有一半是摆不到桌面上来的。我嫉妒他所取得的荣誉。

犯禁忌的实践者

这个声明及对福柯的批判 被媒体大肆刊载 产生了极大的反响。的确 福柯的艾滋病之死 原来只不过是当作谣言在悄悄地流传 而这个声明之后 几乎被作为事实讲了。对此进行猛烈反驳、论战的 是与福柯同居了二十多年、同甘共苦的杜菲尔·达尼埃尔 (Daniell Dover)。他在《解放报》(1987 年 10 月 31 日、11 月 1 日合并号) 的采访中回答问题时 作了如下阐述：

保罗·阿伦·让似乎要说“福柯没敢讲 我敢讲”。福柯就私生活与作品的关系写过不少著作。他想对自己采取禁欲的姿态。只有在这一姿态中，他的死方可被领会。阿伦其实并不是在说艾滋病，而是拼命地在说自己是同性恋者。

我和福柯一起生活了二十三年，有着共同的道德选择。如果我是阿伦所说的自卑的同性恋者的话，我就不会设立 AIDES 这个组织了。著作

中，福柯在权力问题的理论构架的论述中设定了自供。他提示到，自供本身并没有价值，通常，自供被用于刑事的调查程序之中。此外，我作为 AIDES 的会长，不能对自供或耻辱作出判断。因为那种事情通过艾滋病人们会有自己的发现。

AIDES是杜菲尔·达尼埃尔于 1984 年底创立的艾滋病患者的救济组织，也是在法国率先进行援助活动的组织。杜菲尔知道福柯晚年一直极力避开媒体、置身于沉默之中的情况。而且，他是受到福柯艾滋病之死的震动之后才开始进行艾滋病患者援助活动的。仅此一点，就可以认为阿伦对福柯的批判是吹毛求疵。

不管怎样 保罗·阿伦·让于翌年的 8 月 20 日因艾滋病死亡 享年六十三岁。在杂志上的自白 以及于其死前的 6 月 21 日的电视访谈‘艾滋病·自白之后’中，他都直言那是追求自己所信奉的‘绝对差异’这一时髦理念的结果。

不由自主地被认为是萨特死后的法国思想界的帝王 并在共同支援波兰运动中被推戴为先锋的福柯 藏不住对沉默的难耐。

可是 福柯本人没有想成为像萨特那样的、对所有的问题都要出言指导的“全面的知识人”，他倒是宁愿经常否定它。正如皮埃尔·博尔迪（Bordu）在《世界报》上的追悼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 福柯名气越大 就越想使自己成为“冲破社会禁忌以确立其理论的一名实践者”。不能不说 不幸的是 生活在萨特式的知识分子

认识论中的阿伦和福柯的乖离，竟相背如此之远。

更有甚者，多米尼科·费尔南德斯（Fernandes）在堪称同性恋文化史的《甘尼米底斯》（Ganymedes）（1989年）中委婉地批评了福柯，他说：如果福柯是同性恋者之事公开的话，或许会因其威望而产生社会性影响。

但是对福柯的批判是妥当的吗？1988年8月28日，当时法国的同性恋者解放运动先驱、同性恋革命行动战线（Fhar）的创始人及其理论支柱吉·奥康卡姆（Gie Occam）因艾滋病死亡。在他的追悼会记录中，记载了他受福柯的影响开展活动之事。^[1]

奥康卡姆曾自问，为什么同性恋者及其行为已遭到厌恶或忌讳呢？他阐述说：这恰恰与对被排斥的“外国人”的移民、外国劳动者 的忌讳、歧视的情况相同。毫无疑问，这个观点与福柯的思想体系是一致的。而且，《世界报》还在追悼会记录中引用了奥康卡姆于1978年4月通过广播与福柯进行对话时所讲的话，即“如果不坦白就不会有同性恋者，因为谁也不会说自己是同性恋者”。

因为自从有了自供这个制度，同性恋者的有罪性就由公认的占统治地位的正常规范加以定性。

友 爱

题材小说

福柯本人从未公然公开自己是同性恋者。可是，

[1]1988年8月30日《解放报》及《世界报》载。

同性恋是他人生的一部分，而并非全部。任何人都没有公开私生活的必要。况且，在同性恋者的纠缠行动（歧视批判 或言说 同性恋者相关杂志的采访或随笔）中 也没有隐晦他们是同性恋者。

所以 迪迪埃·埃里邦也不得不在评传中以强烈的语气反驳保罗·阿伦·让及多米尼科·费尔南德斯：

可是 使福柯厌烦的 可能正是‘自供’这个思考方法本身。他的厌烦心情，可以从其以晚年著作的所有努力中找到痕迹。

尽管如此，世间并未将此事忘却。1990 年 福柯的最后恋人吉贝尔·埃尔基 Elbee Giber 发表了赤裸裸地描写感染艾滋病的小说《致未能拯救我生命的朋友》。小说中的缪吉尔（Muzil）显然让人想到福柯 其同居者斯特凡那（Stéphane）像是杜菲尔·达尼埃尔；而另一个出场人物玛里妮（Marine）又像是臭名昭著的女演员伊萨贝尔·阿贾妮（Isabel Artani）因而这本书瞬间成了最畅销书。吉贝尔·埃尔基本人在《解放报》（1990 年 3 月 1 日载 的访谈“ 艾滋病生涯 ”中，就该小说回答如下：

“ 出场人物 ”的姓名变了三次之多 甚至曾想努力改变出场人物的形象，比如，把缪吉尔弄成黑长发的人，但全然没有成功。……那么，这部书仍是一部小说，不论缪吉尔、玛里妮，或是其他的人

物，出场的人物，并不都是完全写实的。当然，书中的吉贝尔·埃尔基也是出场人物之一。

对方问到 缪吉尔是福柯、玛丽妮不是阿贾妮 这讹传可以接受吗？对这个问题，他作了如下回答：

虽未考虑到‘损毁名誉等’法律上的危险 但是，我没有写真名。因为，这不是一本写福柯、阿贾妮和我之间关系的书。……这是不全面的证词。在这里，所有的东西都被认为与艾滋病有关。所以，福柯之死以及阿贾妮的艾滋病方面的谣言的真相，我并不了解。

进而 当被问及为什么不写关于福柯的书时 他作了如下回答：

福柯死后，我一言未发。虽曾几度被要求作证，也均予拒绝。今后，决不会有言及我们的故事、友爱，我也绝对不等待这种机会。福柯下葬后，我只写过小说《一个男人的秘密》。该书后来收录于我的作品集《纯洁的莫夫（Mauve）》之中。我想把米歇尔·福柯的印象完全忘记。而且，福柯从我心中再生，是难以忍受的，也是不可能的；即使他再生，不但不会给我任何安慰，反而会带来失落感。他在医院苟延残喘之际，我自问为什么干那种事，并记了日记。在那儿，我看到了类似某种

幻觉的东西。我述说着他的苦、他的死，我知道，接下去述说的，就是我自己的命运。似乎是未卜先知，我好像在那时已不知不觉地感到自己感染了艾滋病。

的确 或许在福柯的崇拜者们看来，《致未能拯救我生命的朋友》应是禁书。可是 那种抗拒却表示出对艾滋病患者及同性恋者的歧视之意，这与福柯其人的思想及生平是相悖的，而他们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当然 如吉贝尔所言 被如实描写出的缪吉尔这个人物的所有行动和言论，并非福柯本人之举。正如戴维德·梅什 (Meche)《米歇尔·福柯的多舛人生》所言，有的基于传说，有的是创作。尽管如此 从中也确能看出 那种逼真的情节 只有与他亲近的人方可知晓。吉贝尔死 1991 年 12 月 27 日 后，该书的日文译本出版，成了拥有广泛读者的畅销书。虽无摘要本书之必要，在此亦要浓缩几个要点加以介绍。

缪吉尔这个出场人物于 1981 年前后在与吉贝尔一起用餐时 所说了艾滋病的事 但是 他并不相信确有其病。世界名人缪吉尔在进入 80 年代之后 想让自己的名字消失。媒体的追踪使他感到痛苦。缪吉尔尽可能地减少朋友的人数。他与朋友走进某餐厅时，径直走向镜子映不到、客人也看不到的座位。因在巴黎名声太大 所以 他足不出户。

出差到旧金山参加每年一次的研讨会时，在旧金山的同性恋者集中的桑拿浴场，他尽情地享受了喧闹

的晚会。1983 年秋 福柯从旧金山归来 吉贝尔问他：由于艾滋病的缘故，谁也不会去那种地方吧？他回答说：

不。可是，并没有那么多人。这真令人吃惊。虽然大家都感到害怕，可是，这反而成为新的默契的基础，新的温柔和关联正在产生。虽然过去从未搭过话，而今却在相互交谈。谁都清楚，自己去那儿的目的是。

在医院，从院长那里得知自己得的大概是艾滋病之后，他想开始拼命地工作。把两本书的原稿交给出版社以后，他每天都到图书馆检查注释中是否有错误。接着 缪吉尔在自己的公寓倒下、失去了知觉 是斯特凡那发现了这一切。

缪吉尔的弟弟把缪吉尔送到了公寓附近的克里尼克·圣米歇尔医院，而后又让他转到萨贝台尔慈善医院。斯特凡那对吉贝尔说 是刚刚才听到的 福柯的病是不治之症 他的脑中有几个无法动手术的病灶 并说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这事成为巴黎街谈巷议的话题。医生禁止他的血亲以外的人探视。

一天下午，吉贝尔的记者同事问他是否有福柯的照片 他便立即赶到了医院。

缪吉尔死了。

翌日 在与斯特凡那一起吃午饭时 他得知缪吉尔的死因是艾滋病。斯特凡那故作不知，跟着缪吉尔的

姐姐到医院的死亡登记处看了记录。是福柯的姐姐要求将“死因艾滋病”的记载完全删除。因为，那必须绝对保密。

“沉默的文化”

实际上名噪一时、人人称道并非米歇尔·福柯所望。名气越大，他的孤独也就越深。吉贝尔的书或许是虚实相间，但是他确实正确地写出了福柯晚年的孤独。福柯于去世前一年在加拿大杂志《生活的态度》(Ethos)上刊载的、谈及自己的幼年时代故事的访谈^[1]中阐述了“沉默”的意义。

福柯：我的幼年时代是在小市民中、而且是在法国地方的小市民中度过的。在我看来，必须与来客寒暄、谈话的风俗，是奇怪和无聊的。我时常感到纳闷，为什么大家都认为一定要说话呢？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沉默有着很深的意义。

瑞金斯：有评论说，北美的印第安文化中的沉默成分，要比英语国家的文化或法语国家的文化中的大得多。

福柯：是这样。不幸的是，沉默是我们的文化撇掉了的东西之一。我们不再拥有沉默的文化。进而言之，我们同样不拥有自杀的文化。日本人拥有那种文化。年轻的罗马人和希腊人，受到过这样的沉默训练：面对同坐的不同的人，以各自不同的方法来沉默。那时，沉默是体现与他人关系的特别方式。沉默是优雅的、不可或缺之物。我希望这种沉默的生活态度得以

[1] 访谈的日期是 1982 年 6 月 22 日。采访者为斯蒂芬·瑞金斯 (Stephen Riggs)。

推广。

友情—友爱的消失

福柯又于 1982 年 6 月在加拿大多伦多进行的访谈中阐述如下：

现在，最感兴趣的是友情—友爱 (amitié)。古代的很长时期，友情—友爱一直是社会关系的重要方式。这方式中，男人们享受着某种自由、做着某种选择。毫无疑问，那也是情爱关系。而且，友情—友爱与经济、政治密切相关。例如，人们帮助自己的朋友是理所当然的。可是，从 16 世纪到 17 世纪，至少在男人的社会中，这种友情—友爱消失了。友情—友爱被视为某种危险之物，批判文章屡见不鲜。军队、学校、政府等所有组织中，这种情爱关系均在被压抑、被消灭。按照我的假说 男人间性爱的麻烦 是从 18 世纪开始的。

我认为，如果说在这个时代同性恋成了一个 问题、一个社会问题，那是因为友情—友爱消失了。友情—友爱表现出某种重要的东西，只要它被社会接受，即使男人间结成性的关系，谁也不会 有所介意。男人间是否结成性的关系，并不算什么事儿，那是不重要的事情。

它没有任何社会的相关，而是作为文化被接受。男人间无论是做爱、还是接吻，都不是重要的事。一点儿也不重要。可是，作为文化被接受的